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成果

生态语言观与生态诗学、 美学的语言哲学基础建构

Ecological View of Languag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inguistic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Ecopoetics and Ecoaesthetics

赵奎英/著

 人 民 出 版 社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成果

生态语言观与生态诗学、 美学的语言哲学基础建构

Ecological View of Languag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oetics and Aesthetics: A Foundation of Ecopoetics and Ecoaesthetics

赵奎英/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李 惠

封面设计:王玉浩

责任校对:虹 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态语言观与生态诗学、美学的语言哲学基础建构/赵奎英 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7.10

ISBN 978-7-01-018397-8

I. ①生… II. ①赵… III. ①语言哲学-研究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51827 号

生态语言观与生态诗学、美学的语言哲学基础建构

SHENGTAI YUYANGUAN YU SHENGTAI SHIXUE MEIXUE DE YUYAN ZHEXUE JICHU JIANGOU

赵奎英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市燕鑫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5

字数:380 千字

ISBN 978-7-01-018397-8 定价:6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本书是奎英由山师大调到南大后的第一本书，书名是《生态语言观与生态诗学、美学的语言哲学基础建构》，应该是国内第一本把生态语言观与生态诗学、生态美学结合起来进行集中研究的论著。本书的创新之处甚多，包括对生态语言观进行系统的界定；对西方哲学史上的自然语言观的生态意义进行系统的梳理；对海德格尔的生态伦理学进行创新性研究；从语言的视角对生态审美观念进行本源性探究；对戴维·艾布拉姆的身体现象学语言观进行发掘；对道家的生态语言观进行研究，等等。本书其实也是奎英20多年来对于语言学美学进行研究的拓展和结晶。赵奎英的硕士与博士论文做的都是与语言学美学相关的研究，那还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事情，后来研究生时期的成果在答辩时获得好评，其中的有关文章在《文学评论》等重要期刊发表。2011年，赵奎英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做访问研究，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生态语言学，吸收了西方最新的生态语言学成果，结合中国的实际，和自己原来的生态语言观和生态美学等方面的研究，将自己的语言学美学研究推进到新的高度和新的阶段。本书就是赵奎英近10年来在这一领域研究的新成果。我想它的出版对于我国的当代生态美学与生态文艺学建设，乃至整个美学与文艺学学科建设都会起到推进的作用。

我国生态美学研究从1994年开始至今也只有短短的23年时间，这是一个全新的充满争议的领域，从“生态”一词的使用开始在看法上就出现分歧，有的说是“生态”美学，有的则说是“环境”美学。但无论如何，目前

生态美学（或者是环境美学）已经基本被学术界接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可以说对于生态语言观的研究是生态美学的新发展。西方早在生态美学产生之初就涉及到生态语言观的问题。欧陆现象学美学，以海德格尔为其代表，将语言看作存在之家，是真理的澄明之境，是人的本真的展开。到梅洛—庞蒂进一步将语言与人的身体相联系，在“身体间性”之中阐释一种生态语言观，可以看作是对生态美学也是对生态语言观的新发展。英美分析哲学中的环境美学实际上也涉及到生态语言观的问题，只是它是从另一个角度涉及语言问题的。英美分析哲学从分析语言的合适与不合适着眼，认为将自然视为对象的自然美学和“如画”风景观对于环境审美是不适合的，只有人与环境融为一体的环境模式才是适合的。这种语言分析具有某种科学色彩。当然，还有就是中国古代的语言观，因为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经济前现代社会，以农为生是中国古代的基本生存方式，天人合一，主客相融是基本的文化模式，所以中国古代的语言观大体上都是“万物一体”的生态语言观，赵奎英在本书中特别论述了道家的语言观，特别是道家的“道法自然”、“大美无言”、以自然的方式“言”的“言无言”的语言观，完全是一种人与自然一体的生态语言观。我想赵奎英能否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以中国古代传统为基础的生态语言观，因为中国古代还没有受到工具理性主客二分的浸染，还没有赵奎英书中讲的那种理性主义的语言霸权，是完全的自然生态状态的语言形态，这对于新的生态语言观的建设将更加富有价值意义。

赵奎英在书中从探索“生态学”的原义入手，对生态审美的基本范畴进行了自己的梳理，认为生态概念包含三个关键义项：家园、生命与关系性，如果说一个人是具有生态观念、生态意识的，就意味着他是关心栖居家园的，关心生命存在的，关心关系整体而不是主客分离、人类中心主义的。按照这一界定，那种对自然的生态审美，也应该是关注生命存在的审美，关注家园栖居的审美，是注重相互关系的作为“栖居者”的“在之中”的审美。我觉得这是一种新的富有创新的概括。“家园”是指人与自然的的关系，是一种温馨的融为一体的“在家”之感，即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在之中”；而生命则是生态美学的要旨所在，生态美学不是冷冰冰的以形式美为主的认

识论美学，而是活生生的生命美学，是生存之美的核心所在。至于关系性则道出了生态美学的相异于传统美学之处，传统美学是一种实体性美学，强调实体的美，而生态美学则是一种关系性美学，是“此在”的生命体验。赵奎英的概括、论述包含了她的新思考，并且指出了常常被人所忽视的这种生态审美观与生态语言观之间的关系。

本书的出版是生态美学的新收获，也是奎英学术工作的新收获，标志着奎英走向更加成熟的学术道路，我为她高兴并衷心地祝贺她。在仲春时节写了如上的话，作为自己学习奎英这本论著的一点感受，也作为本书的序言。

曾繁仁

2017年3月21日于济南

目 录

序.....	曾繁仁 1
导 论 语言与生态.....	1
一、生态诗学、美学研究与语言问题的提出	1
二、生态语言观与生态诗学、美学研究的语言哲学基础问题	15
三、语言的“附魅”“祛魅”与“复魅”对生态诗学、美学建构 的不同作用	24
第一章 西方古代自然语言观与重申现实主义的生态批评.....	35
第一节 西方古代自然语言观与“摹本主义”的“词物对应论”	35
第二节 西方古代“自然语言观”与“词物对应论”是模仿再现 诗学的语言哲学基础	43
第三节 模仿再现理论与重申现实主义的生态批评	49
第四节 重申现实主义的生态批评及其语言哲学基础反思	60
第二章 西方近代自然语言观与浪漫主义的生态诗学.....	78
第一节 西方近代自然语言观与“表现主义”的“词物对应论”	78
第二节 西方近代自然语言观对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	87
第三节 浪漫主义诗歌与乔纳森·贝特的 浪漫主义生态诗学	102

第四节 浪漫主义生态诗歌、诗学与西方近代自然语言观的生态局限性	121
第三章 海德格尔“大道”自然语言观的生态诗学、美学意义	139
第一节 海德格尔的“大道”自然语言观与“词物共生论”	139
第二节 “词物共生论”对语言与自然关系的重建	149
第三节 “大道”自然语言观对人类中心主义独白话语的批判	153
第四节 语言的“大地性”根基与对生态审美栖居的呼唤	163
第四章 海德格尔的“诗性道说”语言观与生态伦理学	174
第一节 海德格尔的“生态伦理学”与“生态语言诗学”	174
第二节 生态伦理学对世界图象的批判	198
第三节 生态伦理学对技术统治的反思	207
第四节 生态伦理学对诗人天职的追问	224
第五节 生态伦理学对诗意栖居的期备	241
第六节 生态伦理学与“诗性道说”语言观	261
第五章 海德格尔的生态伦理学与生态审美观念的确立	279
第一节 卡尔松自然环境模式的根本矛盾	279
第二节 从自然环境模式到生态审美观念	289
第三节 海德格尔的生态伦理学与生态审美观念的确立	304
第六章 艾布拉姆的生态语言观与生态诗学、美学中的语言基本问题	335
第一节 艾布拉姆的身体现象学语言观	336
第二节 艾布拉姆的身体现象学语言观是一种生态语言观	343
第三节 艾布拉姆的生态语言观与生态诗学美学中的语言基本问题	346

第七章 道家的生态言说方式及其生态诗学、美学意义.....	354
第一节 道不可名与道言悖反	354
第二节 “言无言”与天地自然之境	363
第三节 “言象言”与混沌未分之道	370
参考文献.....	376
后 记.....	385

导 论

语言与生态

一、生态诗学、美学研究与语言问题的提出

(一)“诗意栖居”的目标与生态诗学、美学研究中的语言问题

自 20 世纪 90 年代生态批评在西方欧美国家兴起、生态美学研究在国内学界产生以来，它们如今都已成为文学、美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学术领域。但伴随着生态批评、生态美学的成长壮大，人们对于它们的批评质疑似乎也从未停歇过。学术界对于生态批评的批评主要认为它缺乏理论化，对于生态美学质疑最多的则是它作为一个学科能不能成立的问题。而这些争议的一个共同导向是促使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研究进行更坚实的理论建构。国内学界以曾繁仁先生等人为代表的生态美学研究在理论建构方面已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生态批评的理论建构问题其实也早被一些西方的生态批评家们提出来了。由于当前生态批评的一个根本问题是缺乏理论化，当今生态批评研究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便是如何进行理论化，建立一种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态文学理论”。如果我们沿用西方传统对于“文学理论”的称谓——“诗学”的话，那么“生态文学理论”自然也可以称作“生态诗学”了。《生态批评读本》的编者之一格尔特菲尔蒂就曾谈到生态批评家的“另一项

重要的理论化工程就是试图发展出一种生态诗学”。^① 建立一种“生态诗学”可谓当今中西方生态批评家共同努力的学术方向。美国生态批评的先行者威廉·鲁克特、英国生态批评的最大代表乔纳森·贝特、美国环境批评的最大代表劳伦斯·布伊尔都提到过建立“生态诗学”的问题。另外，华和荣(Hwa Yol Jung)、乔纳森·斯金纳等，也都对“生态诗学”的界定做出过努力。斯科特·尼科博克更是在2012年出版了《生态诗学》专著，为生态诗学的建构作出了直接的贡献。而他们是如何界定或建构生态诗学的呢？

我们知道，任何理论建构首先应该解决的就是它的理论基础问题。一种理论只有建立在坚实的、合宜的理论基础之上，它的基本理论问题才能得到有效解决，它的基本理论框架才能逻辑地展开，它的基本学术目标才能更好地实现。但类似于一种循环论证，为了更好地确定理论基础，我们又须首先明确当今的生态诗学、生态美学作为生态文化研究中的两大重要学术领域，它们首先面对的基本理论问题、它们要达到的根本目标是什么？事实上，诸多学者在对生态诗学进行界定时，也的确都是把它的根本目标考虑进去的。

较早提出“生态诗学”概念的鲁克特在《文学与生态学：一项生态批评的实验》(1978)一文中说：“我将尝试探索把生态学与生态学概念应用于文学研究。因为生态学（作为一门科学、一门学科、一种人类视野的基础），它在我近年来的所有研究中，是与我们所居住世界的现在与将来最为相关的。我将试图发现某种关于文学生态学的东西，或者通过把生态概念应用于文学的阅读、教学和写作，去发展一种生态诗学。”^② 在鲁克特这里，生态诗学基本上相当于“文学生态学”，是一种把生态学应用于文学的研究，是诗学与生态学的结合。由于生态学是与人所居住的世界最为相关的，生态诗学的核心任务因此也是与创造一种健康的居住环境相关的。但在鲁克特提出

① Glotfelty, Cheryll & Fromm, Harold eds.,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Athens, Georgia: Georg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XXIV.

② William Rueckert, "Literature and Ecology: An Experiment in Ecocriticism" in Glotfelty, Cheryll & Fromm, Harold eds.,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Athens, Georgia: Georg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07.

“生态诗学”后的近10年间里，这一概念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直到1984年，华和荣在《通向生态诗学的定义》一文中再次提出对生态诗学的界定问题。^① 华和荣提出，生态诗学是“把两种观念无缝地结合为一”，是把“生态学与诗学亲密地聚集在一起”。华和荣的生态诗学明显受到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他认为“海德格尔的思想对于生态诗学来说是一种无可挑剔的路标”。“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诗歌不是为逃避大地而超越大地，而是把人（男人和女人）带向大地，使人属于大地：它让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所以在华和荣那里，“生态诗人的思想应当教会我们如何栖居在大地上”。^② 华和荣之后，更系统地探讨生态诗学建立问题的是乔纳森·贝特。他的《大地之歌》（2000）其实就是一部浪漫主义的“生态诗学”。他说：“我把这部书看作是一个生态诗学的实验”。^③ 与华和荣相一致，贝特的生态诗学思想也明显受到海德格尔的影响，也强调生态诗学与诗意栖居的关系。不过贝特对生态诗学的界定，是与他“生态”和“诗学”原义的考察结合在一起的。贝特通过词源学的考察指出，生态（ecology）的原义就是“家”“房屋”“栖居地”，“生态的前缀eco-是从古希腊词oikos‘家或栖居之地’来的。”而他说的“诗”（poetry）也是从古希腊意义上的“poiesis”来理解的，它的意思是“制作”（making）。这里的制作不仅指用语言进行的制作，也指用其他材料进行的艺术制作，但后来发展成为专门的诗意艺术，“诗歌”。他把“生态”与“诗学”的原义相结合，认为“生态诗学寻问的是在什么方面一首诗可以被视作是一种关于栖居地的制作？”在贝特看来，“生态诗学”与更重实践的、具有更强政治色彩的“生态批评”不同，“生态诗学不是作为环境问题的假定或建议提出来的，而是作为对在地球上栖居意味着什么的反思提出来的。生态诗学必须关注意识。当涉及实践的时候，我们必须说另一种话

① 参见朱翠凤：《温德尔·贝里的生态诗学思想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5月，第4页。

② Hwa Yol Jung, “Toward the Definition of Ecopoetics”, *Mickle Street Review*, Issue 5, 1984: 25-26.

③ Jonathan Bate, *The Song of the Earth*, London: Picador, 2000, p.64.

语。”^①由此可以看出,在贝特那里,生态诗学的目标是与改变人们的意识,使人学会在大地上栖居联系着的。贝特之后,使用生态诗学概念的人明显增多,并且同样也强调生态诗学与诗意栖居的关系。如《生态诗学》期刊的主编乔纳森·斯金纳,在两次界定“生态诗学”时,都突出强调生态诗学与栖居、家园的关系。2001年,在生态诗学创刊时,他对“生态诗学”的界定是“一种家园的制作。”^②后来他“考虑到当下一些生态诗学的实例”,再次尝试给生态诗学下定义时,生态诗学的对象和范围扩展到“所有形式的制作”,关注的焦点也从主题转移到惯用语、修辞和对各种比喻用法的研究、转移到对绿色话语自身的制度化批判,但仍然没有背离生态诗学关心诗意栖居这一根本主题,认为生态诗学涉及“一系列的汇聚在我们现今唯一知道的地球‘家园’(oikos)中的实践”。^③

生态美学与兴起于西方的生态诗学、生态批评有所不同,它是一个更具有本土性的研究领域。尽管“生态美学”概念较早也是在西方出现的,由加拿大学者约瑟夫·米克于1972年在《面向生态美学的札记》一文中提出,比中国学者李欣复发表在1994年的《论生态美学》一文要早好多年,^④但仍然不得不说,生态美学研究的主要阵地在中国。在当今相关领域的美学研究中,西方学者更倾向于使用“环境美学”的概念。中国学者更倾向于使用“生态美学”的概念。西方学者所说的“生态美学”主要是一种生态学的环境美学,可以看作是环境美学的一部分;中国学者的生态美学研究虽然也受到西方环境美学的影响,但它与西方学者的环境美学以及生态美学研究都有明显差异。中国学界的生态美学研究从李欣复1994年发表《论生态美学》一文开始,到徐恒醇于2000年出版《生态美学》著作,到2001年曾繁仁

① Jonathon Bate, *The Song of the Earth*, London: Picador, 2000, p.42, p.75, p.266.

② Jonathan Skinner, “Editor’s Statement”, *ecopoetics* 1 (2001): 5-8. See Christopher Arigo, “Notes Toward an Ecopoetics”, *How2*. http://www.asu.edu/pipercwcenter/how2journal/vol_3_no_2/ecopoetics/essays/arigo.html.

③ <http://jacket2.org/commentary/jonathan-skinner>.

④ 程相占:《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区别》,《学术研究》2013年第1期。

先生发表《生态美学：后现代语境下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一文，以及后来的一系列论著的出版，再到其他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国生态美学研究可谓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尽管学界在生态美学能否成为一个学科的问题上争议不断，中国学界的生态美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却为世人所瞩目。在当前中国学界的生态美学研究中，就像朱立元先生等人所说的，“尤以曾繁仁‘生态存在论’美学观影响为巨”。^①而以曾繁仁先生为代表的生态存在论美学正是以培养人们的“生态审美观”和“生态存在观”，以促成一种“生态审美栖居”或“诗意地栖居”为根本目标的。^②这样一来，我们发现，生态美学与生态诗学尽管是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在许多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别，但在根本目标上却是一致的，它们都是以“诗意栖居”作为根本目标的。这也正是我们把二者放在一起谈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如何才能达成生态诗学、美学的这一根本目标呢？华和荣认为，“生态诗学的‘职责’是通过语言在人类及其周围世界之间发明一种新的情感认识论”。在一种重要的意义上，“生态诗人既是语言的运用者，也是语言的看护者。”“他的语言必须与人与物的世界相谐和”。生态诗人“教会我们如何与其他人，与自然中的大量的、无数的物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一句话，教会我们如何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③与华和荣相似，贝特也认为生态诗学的建立必须通过“语言之路”。他说：“由于生态诗学肯定的不只是存在，而且还有自然之物本身的神圣性”，“它需要寻找到一条穿越怀疑主义，到达一个清理过了的、超越了那种把语言视作一个自我封闭系统的重重障碍的道路。”^④这也就是说，在贝特看来，生态诗学要想实现自己的目标，进行理论建构，首先面对的一个理论问题是寻找一种能超越那种把语言视作封闭系统的语言观的问题。

① 朱立元、栗永清：《从生态美学到生态存在论美学》，《东方丛刊》2009年第3期。

② 曾繁仁：《生态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82、316—317页。

③ Hwa Yol Jung, “Toward the Definition of Ecopoetics”, *Mickle Street Review*, Issue 5, 1984: 26-27.

④ Jonathan Bate, *The Song of the Earth*, London: Picador, 2000, pp.247-248.

另外,谈到“生态诗学”的环境批评家布伊尔,虽然对于生态诗学本身没有太多阐述,但他也提出“重塑意识”“重新栖居”的问题,并且布伊尔也特别强调语言与世界关系的问题对于生态批评的意义。而尼科博克的《生态诗学》专著,副标题即为“自然的语言,语言的自然”,更是明确地提出生态诗学的建构需要系统地探讨语言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生态诗学就是要为语言与自然、伦理与审美之间的友好关系提供自然的场所。^①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栖居问题更是一个语言问题。因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唯语言才使存在者作为存在者进入敞开领域之中。”^②海德格尔提出,为了认识到这一点,需要提出一种“正确的语言概念”。但重要的“不在于提出一个新的语言观。重要的是学会在语言之说中栖居。”^③其实,华和荣、贝特的生态诗学思想、曾繁仁先生的生态美学思想,也正都受到海德格尔后期语言哲学和诗学的明显影响和启发。

无论如何,以上梳理表明,生态诗学、美学研究共同关心的栖居问题是与语言问题密切相关的,生态诗学、美学理论建构面对的一个首要问题,是寻找一种新的能够作为生态诗学、美学理论基础的语言观的问题。贝特、布伊尔、尼科博克等人在生态诗学理论建构中提出语言问题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这实际上已成为当今西方生态批评、环境批评、绿色文化研究等各种生态诗学、文化研究的一个基本理路。那就是说,要想使生态诗学、文化研究站得住脚,首先要批判对生态文化理论不利的各种语言理论,尤其要批判的是结构主义把语言看成一个自我封闭的形式系统、后结构主义把自然看成一种文化建构的话语优先理论。尽管目前生态诗学研究对待结构—后结构主义的关系不像文学批评初始时期那样敌对,但对于语言观念的反思仍然势不可免。情况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语言问题与生态问题本来就存在着关联,

① Scott Knickerbocker, *Ecopoetics: the Language of Nature, the Nature of Language*, Amherst and Bost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12, p.9.

② [德]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海德格尔选集》上卷,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94—295页。

③ [德]海德格尔:《语言之说》,《海德格尔选集》下卷,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003—1004页。

使得人们无法越过语言问题直接谈论生态诗学的建构问题。语言问题与生态问题的关联一方面是由人的语言存在本性内在地决定了的,另一方面则是由生态文化兴起的语言化、符号化的后现代语境促发的。

(二)“语言时代”与生态诗学、美学研究中的语言问题

一般说来,生态问题虽然早已存在,但人们对生态文化问题的自觉关注则是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也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后现代”时期开始的。如果说西方历史上的“现代”是以工业文明为标志的,那么“后现代”也即“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也被后现代理论家们宣称为“高科技媒体社会”,则是以高度符号化、语言化的后工业文明为标志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不再花时间生产和交换商品或服务,而是生产和交换信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人们将越来越多地与符号系统发生交汇,越来越少地与社会的、生物的或自然的环境打交道——这种生活方式已经是许多人都熟悉的方式。”^①在这种后工业文明中,不仅社会现实是高度语言化、符号化的,堪称一个“实实在在的语言时代”,^②而且后现代的文化理论,也是那种强调话语优先性的、以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话语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就像后现代理论研究者凯尔纳与贝斯特所指出的:“就赋予话语理论以优先地位这一点而言,后现代理论大体上追随了后结构主义。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后结构主义,都发展出了用符号系统及其符码和话语来分析文化和社会的话语理论。”在这种话语理论看来:“心理、社会以及日常生活乃是由语言、符号、形象、符码以及指意系统(signifying systems)组织起来的”。^③

人们通常认为,当今的生态危机主要是由工业文明造成的,产生在后

① M. A. K. Halliday and J. R. Martin, *Writing Science, Literacy and Discursive Power*, London and Washington, D.C: The Falmer Press, 1993, p.21.

② [法]海然热:《语言人——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张组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年版,第 4 页。

③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3—34 页。

现代语境中的生态学、生态批评等生态文化，作为后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基于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批判反思的。但实际上，并不只是工业文明才是生态问题的罪魁祸首，也不是所有的后工业文明或后现代文化都是生态文化的福音。如果说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让自然受到了血淋淋的“外伤”，损害了自然的“肌体”，那么，以高度语言化、符号化为标志的后工业文明，则让自然受到了看不见的“内伤”，加剧了当今时代的生态危机。这首先是因为，高度符号化、语言化的后现代的社会现实从现实形态上遮蔽了自然，它麻木了我们对自然的感觉，抑制了我们对自然的欲望。它让我们沉溺于虚拟的符号世界之中，通过与一个虚拟世界的游戏，使我们忘怀了与真实的自然世界的交往，加剧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疏离。其次还是指以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强调话语优先地位的解构性的后现代文化理论，从观念形态上根本性地取消了自然。在他们看来，所谓的“自然”不过是一种文化的“建构”、一种语言的“词汇”，它从来都没有真正存在过。符号化、语言化的后现代状况与强调话语优先性的后现代理论相互呼应，共同压抑着、消解着“自然”的现实和“自然”的概念，难怪美国后现代思想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认为，在当今西方的后工业社会里，真正的“自然”已不复存在，各种各样的现实就像一个典型的符号系统，在把语言学当作一种方法和把我们今天的文化比作一场有规律的虚妄的噩梦之间存在着非常和谐的对应关系。^①

与这种整体的时代氛围相一致，在这种后现代语境中生成的许多文学、文化批评理论也弥漫着这种取消自然、压抑自然存在的气息。就像英国生态批评家、绿色研究者劳伦斯·库珀所说的，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不同的批评理论，如形式主义、心理分析、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等，它们一个共同的假设是，“所谓的‘自然’，它首先是在文化话语中作为一个术语而存在，离开这一点，它既没有存在也没有意义。”以致库珀义愤地指出：“宣称‘没有自然这样一种东西’几乎已经成了文学或文化研究中的一

① [美]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语言的牢笼》，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